

“四書”和“五經”在意大利的歷史和傳統

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

我今天想介紹一個有關“五經”傳入意大利的簡介：耶穌會會士是如何將中國典籍的內容和含義首次引入歐洲？對他們來說中國典籍又意味着什麼？

利瑪竇(1552—1610)曾論述中國文學，尤其是首批注意到“四書”、“五經”的西方學者之一。在這封寫於1595年12月4日的南昌的信中，利瑪竇向耶穌會會長 Father Acquaviva 解釋了“四書”、“六經”的重要性。他說科舉考試均與“四書”有關，但是：

除了這些道德方面的書籍，還有古老的“六經”。每個考生只學“六經”之一，因為只需考察其中一門。然而，當我們打算傳播我們的神聖信仰之時，在這些年里除了“四書”外我也從老師處學習了“六經”。^①

1591—1595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1594—1595年，利瑪竇節選“五經”；1595—1596年，利瑪竇結合節選的“五經”撰寫《天主實義》(*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的頭稿。

《天主實義》於1603年在北京首次出版(200冊)，利瑪竇隨後將作品寄給羅馬的 Acquaviva 會長，並親手加上馮應京的序，他自己所作前言，還有中國典籍的拉丁文概述。在羅馬的基督會檔案館中有該書的第三版。

在中國禮儀之爭白熱化的情況下，教皇 Clement XI 在1704年下令禁止使

作者單位：意大利威尼斯卡佛斯卡里大學亞洲與北非研究學院(Ca' Foscari University, Venice)

① 參見 M. Ricci S.I. (1552—1610), “P. Claudio Acquaviva S.I., Preposito Generale—Roma, Nanchang, 4 Novembre 1595”, in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a cura di F. D’Arelli, Macerata 2001, p. 315.

用“天”和“上帝”來稱呼天主(God)。因此,在此後的印刷物中,這些詞語都被“天主”取代。

在《天主實義》的拉丁文概述中,利瑪竇評論道:

這裡解釋了中國哲人被中國人認為神聖的六部古書中的段落。^①

利瑪竇和耶穌會會士的主要目的是表明中國的典籍證明了被中國人等同為“上帝”的“天主”的存在。在第一段你可以看到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看看利瑪竇是如何操縱中國典籍的。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注曰:“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為二,何獨省文乎?”(天主實義)

接着他又引用《易經》、《禮記》和《書經》的段落來鞏固自己有關上帝的理論。

下面是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提及的“五經”的所有章節^②:

- 書經

- 唐書

- 堯典

- 皋陶謨

- 益稷

- 商書

- 湯誓

- 湯誥

- 盤庚

- 西伯戡黎

^① 參見 M. Ricci S.I. (1552—1610), “P. Claudio Acquaviva S.I., Preposito Generale—Roma, Nanchang, 4 Novembre 1595”, in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a cura di F. D’ Arelli, Macerata 2001, pp. 123—124.

^② 參見 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 463.

周書

泰誓

牧誓

金縢

康誥

召誥

多士

多方

● 詩經

大雅

文王

大明

下武

烝民

周頌

執競

商頌

長發

● 易經

乾文言

繫辭傳上十一

繫辭傳下四

繫辭傳下五

說卦傳

● 禮記

月令

表記

● 春秋左傳

昭公七年

● 四書

大學

中庸

一章

十六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二章

論語

八佾

公冶長

雍也

述而

顏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微子

孟子

梁惠王

公孫丑

離婁

告子

盡心



圖1 17世紀《中國賢哲孔子》

這裡我們能看到一張描繪孔子在國子監中的圖片(圖1),出自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的《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1687)^①。

圖中左側的架子上,你會注意到“四書”、“五經”被混合放置,從上到下依次為:《書經》、《春秋》、《大學》、《中庸》和《論語》。右邊的架子上:《禮記》、《易經》、《繫辭》、《詩經》、《孟子》。

^① 參見 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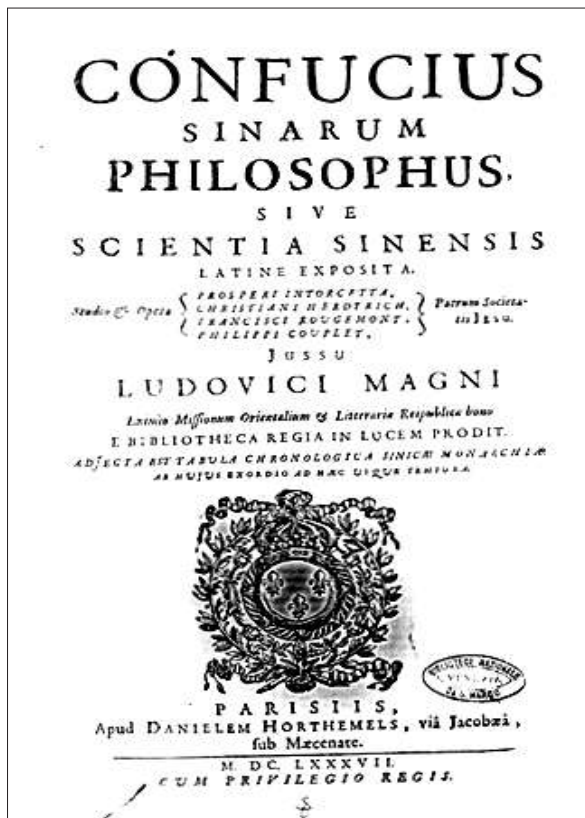


圖2 《中國賢哲孔子》封面

這是《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封面(圖2)。此書表明了利瑪竇所用的整合傳教法的延續。至少參與此項目的十七名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會士及一些中國人這樣做了。此書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包括“四書”中三部的轉寫和翻譯:《大學》、《中庸》和《論語》。追隨由利瑪竇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453—1607)建立的傳統,17世紀耶穌會會士繼續采取儒學—天主教整合的方式來同化中國。柏應理,完成《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的關鍵人物,將此書獻給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柏應理是比利時人,於1622年或1623年出生於梅赫倫(Mecheln),1654年在布魯塞爾被授予聖職。耶穌會會士首先將三部經典的翻譯編為《中國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一書出版,譯文由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編輯,簡短而粗略。殷鐸澤在《中庸》的翻譯中發揮了

重要作用，此書部分於1667年在廣州出版，部分於1669年在印度果阿出版。書名為《中國政治倫理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最初宣言》(*Proemialis declaratio*)的引言說，耶穌會會士寫《中國賢哲孔子》的意圖不是用來服務“那些住在歐洲的人的娛樂和好奇心”，而是作為傳教士的有用工具，將基督福音傳到中國和其他地方^①。他們使用“四書”譯文作為中文入門書，為的是讓耶穌會會士勝任在中國的工作。正如你們可以在此頁讀到的，作者將“四書”(Tetrabiblion)、“五經”(quinque voluminae)描述為中國最重要的典籍。他們將“五經”根據其重要性分等級，將《書經》放在首位，尤其是因為它涉及三個最重要的統治者：堯、舜、禹，中國第一個傳統王朝的夏王室被認為是禹的後代^②。由於其歷史信息的準確性，《書經》被傳教士們分外推崇。

這是《書經》(1—49章)手寫本中的一頁(圖3)，此書被獻給徐光啓(1562—1633)，16到17世紀皈依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中國人士之一(還有李之藻和楊廷筠)^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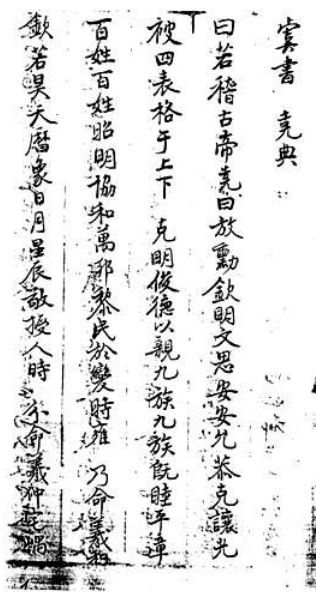


圖3 獻給徐光啓的《書經》手寫本

① 參見 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 260.

②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Paris 1687.

③ 徐光啓書鈔本尚書注釋, Jap-Sin II, 91 A,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它被保存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如封面上所述:*Manu scriptus a Siu Doctore Paul*)。它包括114頁,每頁五欄)。在空白處有非常簡短的文學評論。評論相當粗略,比如有關《詩經》的部分就完全没有^①。根據Nicolas Standaert(在明代晚期對漢學的重新發現很明顯地反映在有關《易經》和《詩經》的著作中。他認為),中國的基督教皈依者,即使在皈依之後,也不會失去對自己文化的興趣;相反他們被激勵重返儒教禮儀和傳統。還有,在他們對典籍的詮釋中沒多少基督教或神學的元素。可能利瑪竇也是在和中國學者的接觸中受到啓發才去追溯典籍的本義。但當然這個趨勢是與他對新儒學的態度相一致的;實際上他因為新儒學受到了佛教的影響而對其抵制^②。我們應該注意到大多數傳教士,除了那些所謂的象學家,都對《易經》持這樣的懷疑態度。

當耶穌會會士研究和翻譯“四書”時,他們更推崇張居正(1525—1582)的評論。《最初宣言》的作者們描述了張是湖廣江陵人,作為首輔忠心耿耿地侍奉萬曆帝十年。據說張死後也受到了優待(不久便收回了優待並將他貶官。但是當萬曆帝決定“書沒罪”的時候這個過程便戛然而止了,他的文學作品也未受到摧毀)。耶穌會士們很清楚在17世紀中期的中國張的名字和文章備受尊敬。《最初宣言》說耶穌會士被張的評論吸引是由於他詮釋古文的能力,因為他的風格既平實又清楚。接着作者們又稱張的評論在當時流傳甚廣,備受好評。

事實上張並不是作為一個重要的文人而著名,而是因為他的政治力量。但是他對“四書”的評論至少印刷了五版,其中四版出現在清朝早年。^③耶穌會士採用張的評論很有可能是因為它非常簡單,實際上這是幼年的萬曆帝(九歲)的啓蒙教材。張的詮釋其實與朱熹的沒什麼大區別,但語言簡單,J. H.-M. Prémare如是說。我們從Fr. Magalhaes'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的

① 參見 N. Standaert.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by Late Ming Christian Converts”, D. Gimpel, M. Hanz, *Cheng-All in sincerity: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Monika Übelhör*, Hamburg, Hamburger sinologie Gesellschaft, 2001, pp. 19-40. 鍾鳴旦,《晚明基督徒的經學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64期,2000,23—50頁。

② 參見 N. Standaert.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by Late Ming Christian Converts”, D. Gimpel, M. Hanz, *Cheng-All in sincerity: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Monika Übelhör*, Hamburg, 2001.

③ 參見 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p. 268-269.

參考文獻中可知,耶穌會士至少在 1668 年便對張居正和朱熹二人的“四書”評論有所熟悉。當耶穌會士積極從事“四書”的翻譯時,在中國便出現了這些張的評論的版本,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舊收藏品中也有其 1651 年、1672 年和 1683 年的版本,這並不是巧合。Mungello 認為可能這些版本是 Couplet 自己帶到歐洲的^①。

現在,我們回到“五經”:耶穌會士們認識到《書經》的卓越性,但他們並不宣稱《書經》的歷史最悠久,反而他們注意到“如果你接受中國人的評論”,那麼《易經》是最古老的經書(Couplet,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 XVII)。一會兒我就回到《易經》,因為在 17 到 18 世紀這是耶穌會士們爭議最多的經書之一。現在我只說《中國賢哲孔子》的作者們將它排在“五經”中的第三位,因其晦澀難懂。他們按照重要性將五部經書排序,《書經》為首,其次是《詩經》,再次是《易經》、《春秋》和《禮記》。

耶穌會士們描述《書經》包含着被稱為殷商的中國第二個王朝或王室的記載。他們接受傳統的編年史,寫道商的締造者是成湯,據記載在公元前 1776 年建立了商朝。排名第二的是《詩經》,第三是被他們認為晦澀難懂的《易經》。他們對伏羲的《易經》持批評態度,尤其是因為他們把這部經典看做是新儒教的源泉,他們認為新儒教是一門無神論的物質主義趨勢的哲學。《最初宣言》的作者們表示“四書”次於“五經”,但也具有很高的權威性,並注意到這九部經典對於向往文人身份的人來說是學習的基礎^②。

在《中國賢哲孔子》的作者中有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一個來自意大利西西里的耶穌會士,他於 1639 年在墨西拿(Messina)加入耶穌會獲得神職。1656 年 1 月 8 日他從熱那亞坐船抵達中國,同行的還有其他九名耶穌會士,包括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他們於 1657 年抵達葡萄牙在印度的主要基地——果阿,接着到了葡萄牙殖民地澳門,殷鐸澤在那里一直待到 1659

① Lundbaek 發現了 1651、1652 和 1683 年版本的樣本,鑑定如下: Fonds chinois 2844—46 (1651), 2847—48 (1672) and 2849 (1683). 參閱 Mungello, p. 270.

② D.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 263.

年,然後被派到中國加入江西南昌的傳教團。1665年9月,被建議反對傳教士的康熙帝下令逮捕他們,殷鐸澤和其他人一起被逮捕到北京,並在1666年被發配到廣州,和24名傳教士關押在一起。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團庶務員的殷鐸澤逃出監獄,於1668年抵達澳門,然後到了果阿,1669年1月21日從那里坐船回歐洲。同時由殷鐸澤翻譯並命名為《中國的政治倫理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的《中庸》,先在廣州印刷了一部分(1667),然後在果阿印刷了另一部分(1669)。1669年他返回歐洲,並於1671年最終抵達羅馬。在意大利傳教時,他在西西里度過了一段時間,很有可能是留下他的肖像畫的巴勒莫。1672年他再度出發到中國,1696年,在71歲時,他在杭州逝世,此前的二十年他在那里度過了大部分的時光,這時距離他第一次到中國將近40年。

這裡我們看到的是殷鐸澤的《中庸》譯本的首頁(圖4)。

這部作品的發表有兩個主要目的:確保在歐洲吸收教徒和捐助,以及通過善待中國文化與中國文人建立友好關係。由於時間充足,譯文相當準確,但是顯示了用自然宗教以及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單神論來詮釋儒家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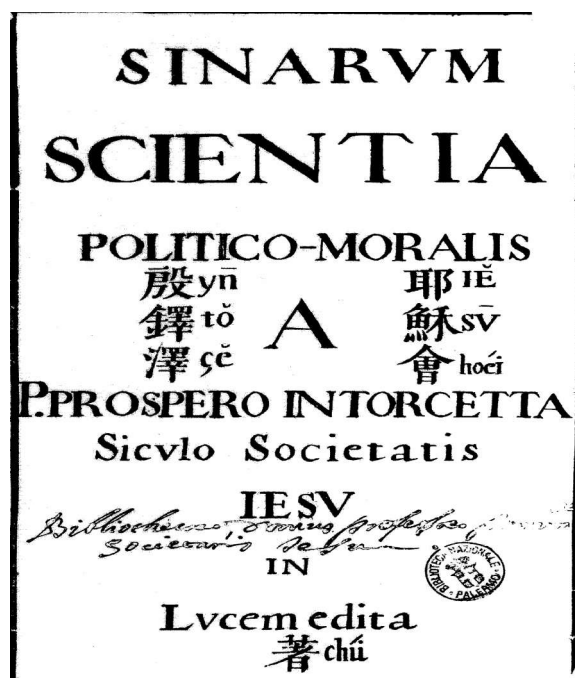


圖4 殷鐸澤《中庸》譯本首頁

的明顯趨勢。



圖5 《中庸》譯本第一頁

這是《中庸》的第一頁(圖5),有漢字,而且相應的詞被標上了數字。看上去像一本識字課本。